

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贯彻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需要以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切实落实市场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要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识,最大范围激发改革力量,最大程度增强改革信心,努力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消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全面深化”

顾海良

(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对改革作出“全面深化”部署时,也对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作出了“全面深化”的阐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的“全面深化”,将更为深刻地展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发展的新视界,更为广阔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创新的新境界。

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的“全面深化”,集中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全面改革的总目标为基点、为基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要求,更加注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注重使社会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要素和资源协同合力、生机焕发;注重让经济体制改革与各项体制改革的成果融汇一体,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二是建立推进全面改革的权威的领导制度。按照时间表,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实现这一时间表,重要的是要突破改革中部门利益固化的樊篱,避免不同方面改革的“零和”状态,杜绝改革那些在改革中出现的新弊端的现象。在领导体制上,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有可能在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上达到统筹协调,产生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效应。三是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中国最大的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一重大的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四是对改革的全面部署。在改革的总体部署上,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六个紧紧围绕”,有利于形成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切实成功。五是凸显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核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六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谋划。经济体制各个方面改革的协调和协同,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全面谋划的要义在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七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的全面理解。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八是对“两个毫不动摇”作了全面阐释。“两个毫不动摇”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深化改革推动新阶段的经济的发展

洪银兴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导)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强大动力。今天的改革与过去 30 年的改革有着延续性，同时反映新的发展阶段的发展要求，有着新的特点。这就是三中全会所说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现在讨论改革问题跟过去三十年的背景完全不一样，因为经济发展已经到了新的起点。这个新的起点概括起来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人均 GDP 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三是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四是城市化已经进入了中期阶段。就经济增长速度来说，我国将结束持续多年 10% 左右的高速增长期，将转入 7—8% 中高速的增长期。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以后，一要转变发展方式，二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要推进城乡二元结构现代化。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改革来推动。

一、当前的发展问题，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现在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这里概括为四个方面，一个是发展模式问题，现在的发展模式基本上还是处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迈进阶段的发展模式。当我们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以后，我们既无法在薪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收入差距达到了库兹涅兹倒 U 型曲线的最高点，腐败指数也达到库兹涅兹倒 U 型曲线的最高点；民众的公平诉求由关心温饱转向教育与健康问题，明显的公民维权意识产生，老百姓不可能继续容忍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更不能容忍由权利不公平所产生的收入差距。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三中全会提出资源配置不仅要讲效率，还要讲公平，现在需要以改革来实现由效率性发展向公平性发展的转变。为此改革的目标是要缩小收入差距，对象是过去改革所形成的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体制，在政策层面上就是要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让大多数人富起来。我们的改革要按照公平性发展的要求，突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一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正因为这样，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机制，我们过去为了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强调资本、技术、管理在收入分配中间的比重，现在收入分配要重点关注劳动者的报酬问题。因此收入分配不能够只是市场调节，需要其他方面的调节，其中包括维护劳动权益的法律调节，企业内部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调整等等；二是在再分配领域强化公